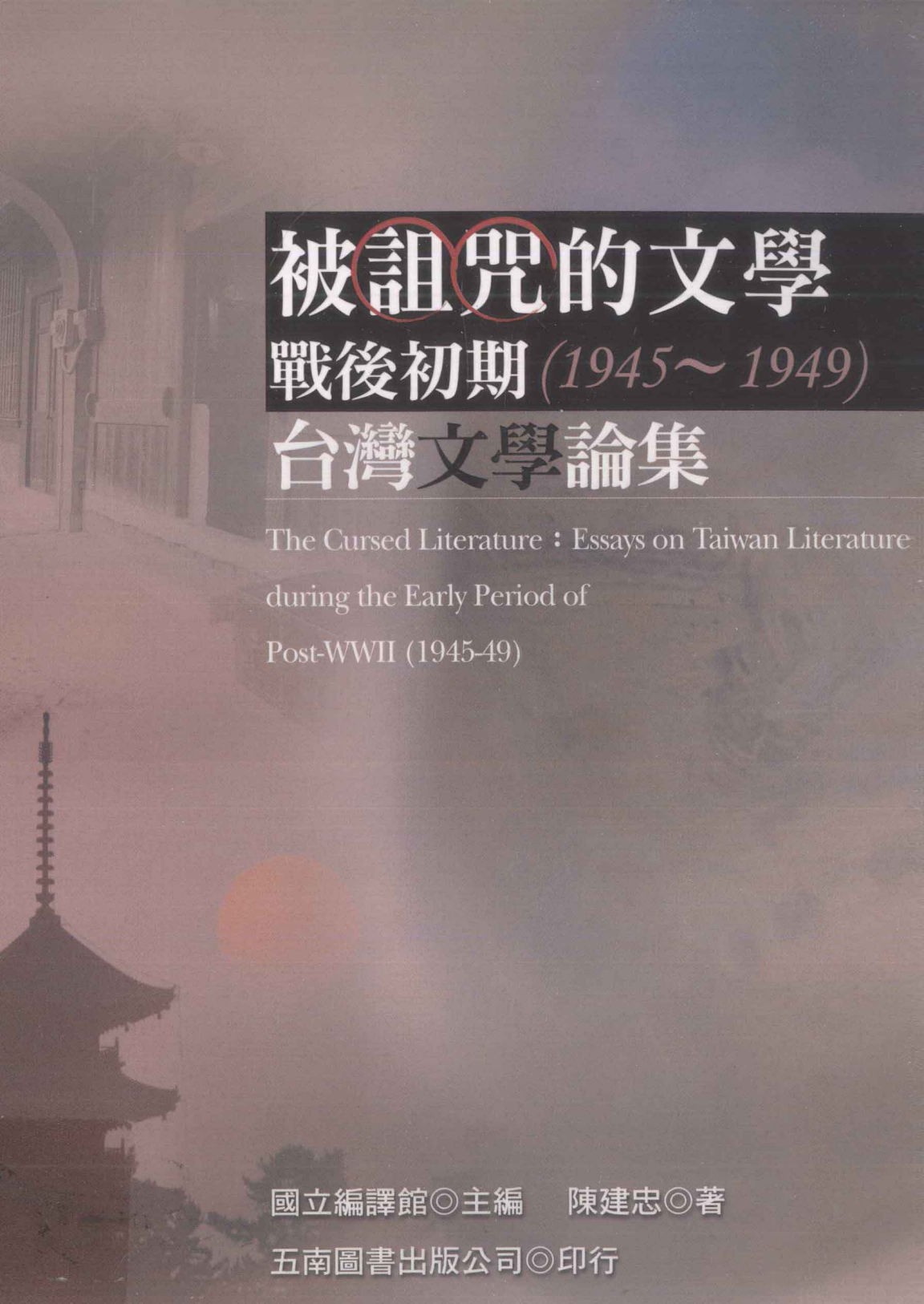




被詛咒的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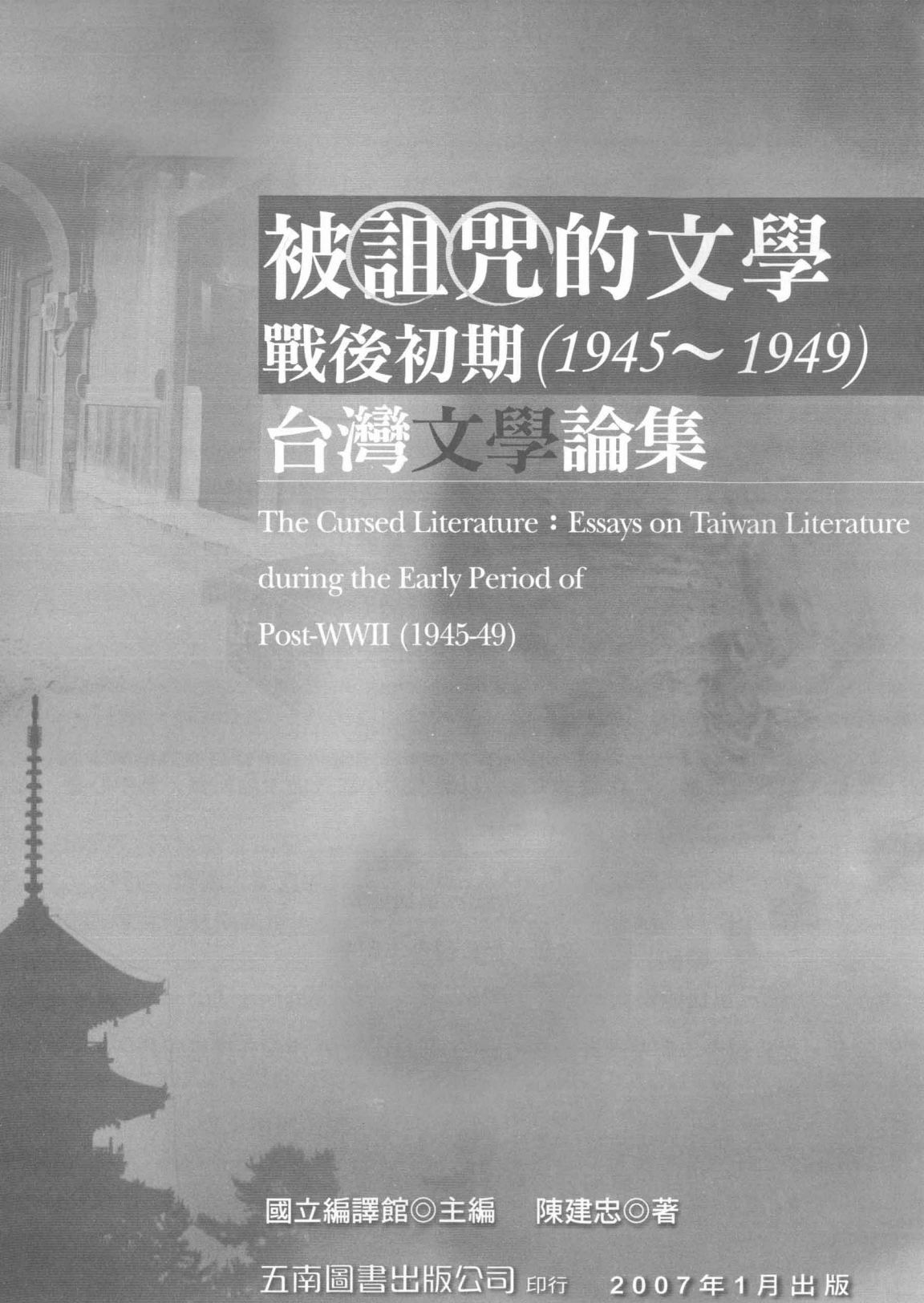
戰後初期 (1945~1949)

台灣文學論集

The Cursed Literature : Essays on Taiwan Literature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Post-WWII (1945-49)

國立編譯館◎主編 陳建忠◎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印行



被詛咒的文學

戰後初期 (1945~1949)

台灣文學論集

The Cursed Literature : Essays on Taiwan Literature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Post-WWII (1945-49)

國立編譯館◎主編 陳建忠◎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2007年1月出版

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1945~1949)臺灣文學

論集／國立編譯館主編 陳建忠著，

一初版，一臺北市：五南，2007[民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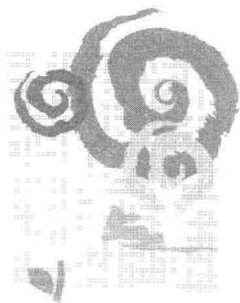
面；公分，參考書目：面

I S B N：978-957-11-4583-9(平裝)

1. 臺灣文學-論文，講詞等

850.322

95023427



1XY3

被詛咒的文學：

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文學論集

主 編 — 國立編譯館

地 址：10644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79號

電 話：(02) 3322-5558 傳 真：(02) 3322-5598

網 址：<http://www.nict.gov.tw>

作 者 — 陳建忠

著作財產權人 — 國立編譯館

發 行 人 — 楊榮川

總 編 輯 — 王秀珍

企劃主編 — 黃惠娟

責任編輯 — 王兆仙 王中奇

封面設計 — 童安安

出 版 者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10670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電 話：(02) 2705-5066 傳 真：(02) 2706-6100

網 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劃撥帳號：01068953

戶 名：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駐區辦公室/台中市市區中山路6號

電 話：(04) 2223-0891 傳 真：(04) 2223-3549

高雄市駐區辦公室/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90號

電 話：(07) 2358-702 傳 真：(07) 2350-236

經/銷售處 — 五南文化廣場

版 刷 — 2007年1月初版一刷

定 價 — 新臺幣500元

目 錄

導論：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文學研究的文學史意義／001

- 一、「戰後初期」作為文學史斷代的重要性／003
- 二、戰後初期的小說之歷史考察與文本分析／004
- 三、戰後初期的文學、文化論述與史觀差異／005
- 四、戰後初期的文藝研究與解嚴後的歷史建構／008
- 五、結語：破除被詛咒的命運／010

壹、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台灣小說的歷史考察／011

- 一、前言：戰後初期台灣文學的重建與中挫／012
- 二、「二二八事件」前台灣小說的歷史考察／017
- 三、「二二八事件」與台灣文學／029
- 四、「二二八事件」後台灣小說的歷史考察／032
- 五、結語：「美好時代」的終結／046
- 六、附錄：戰後初期台灣小說目錄初編／048

貳、自我殖民與「近親憎惡？」：以吳濁流小說〈波茨坦科長〉為中心看台灣戰後初期的後殖民情境／053

- 一、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的台灣小說與後殖民議題／054
- 二、作為「隱喻」的女性：內部殖民主義、祖國崇拜與自我殖民／056
- 三、皇民能得救嗎？：女性覺醒與解殖民的暗示／065

參、從皇國少年到左傾青年：戰後初期葉石濤的小說創作與思想轉折／073

- 一、前言：後殖民知識份子變形記／074
- 二、變相前的真相：葉石濤文學與思想發展的前史（pre-history）／076

三、從浪漫抒情主義到浪漫英雄主義：左傾青年的蛻變歷程／081

四、台灣固有史也：青年葉石濤歷史意識的轉折／089

五、結語：混雜的後殖民主體／100

肆、行動主義、左翼美學與台灣性：戰後初期楊逵的文學論述／103

一、前言：戰後初期的楊逵研究／104

二、日據時期楊逵的文學論述／106

三、「二二八事件」前楊逵的文學論述／113

四、「二二八事件」後楊逵的文學論述／122

五、最後的銀鈴：楊逵文學論述的餘響／136

伍、發現台灣：日據到戰後初期台灣文學史建構的歷史語境／141

一、前言：衰弱的人民與困惑的歷史／142

二、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史的本土建構與「外地文學論」／143

三、永遠的邊疆文學？：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學論爭與台灣文學史
／154

四、結語：台灣文學史中的反抗論述／169

陸、戰後初期現實主義思潮與台灣文學場域的再構築：文學史的一個側面 ／171

一、前言：從「冀現實主義論爭」談起／172

二、現實主義思潮的復甦：1945～1947／180

三、現實主義思潮的激化：1947～1949／193

四、結語：戰後初期文學場域再構築的文學史意義／209

柒、關於虹之虛與實的辯證：評橫地剛《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 畫上的人》／213

一、前言：補史之闕／214

二、虹一般的「黃榮燦像」：歷史建構的合理性與目的性／218

三、反動、落後的台灣美術家？：歷史詮釋中的道德標準／223

四、歷史的真相也許不只一種／231

五、附錄：黃榮燦戰後初期發表作品一覽／233

捌、後戒嚴時期的後殖民書寫：論鍾肇政《怒濤》中的「二二八」歷史建構／239

一、前言：再殖民或後殖民？／240

二、延遲的後殖民記憶書寫：歷史大河小說的政治意涵／244

三、光復還是降服：祖國面貌的重繪／249

四、不完整的主體：日本精神與抵殖民策略／255

五、結語：一種歷史，各自表述：後戒嚴時期的歷史敘述風潮／263

附錄：徘徊於「祖國認同」與「台灣認同」之間：戰後初期台灣文化的重建與頓挫／265

一、奴化論述、文化重建與新興文化領導權／265

二、反奴化論述與反國府論述／269

三、民主主義論與中國左翼文化論述／273

四、尋找台灣文化的黎明：代結語／278

參考書目／281

一、戰後初期（1945~1949）報紙雜誌／281

二、中文專書／282

三、單篇論文／292

四、學位論文／317

五、日文書目／321

六、英文書目／322

七、論文出處／323

索引／325



導論：

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文學研究
的文學史意義

「戰後初期」作為文學史斷代的重要性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而台灣也就從「殖民地」的稱號下被解放開來，回歸「祖國」。戰爭的終止常意味著另一個時代的到來，這對台灣人來說尤其如此，因為台灣被「光復」了，台灣人也無條件要在一夕之間由「日本人」變成「中國人」。然而很不幸的是，幾年之間，台灣人被捲入國共內戰的漩渦中，也與「祖國」政權間產生了無數問題。台灣文學的發展則從戰後被期待重建的熱情氛圍裡，迅速遭受到頓挫的命運。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國民黨政府公布戒嚴令，為國共內戰中失利即將遷臺的統治者預做「清掃」的工作。同年十二月七日，國府中央正式撤退來臺。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三日，公布「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並隨著韓戰爆發（六月廿五日），美國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台灣社會便在「世界冷戰」與「國共內戰」雙重架構的支配下，以反共復國為綱領，由「反共」、「戰鬥」文學管領文壇。一九五〇年之後，台灣文學已然是一個新的文學階段。

這段由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直到一九四九年國府撤退來臺前的這段期間，便是本書所指稱的「戰後初期」（early post-WWII period, 1945~1949），也是台灣文學史上一個極其重要、但一直尚未獲得充分正視的研究範疇。

將台灣「戰後初期」，視為一個重要的研究範疇，對筆者而言，首先是一個「文學史」問題，這是理解日據台灣文學如何過渡至國府統治時期文學發展的關鍵時期。一般論述大多將戰後初期文學簡單帶過，而較少深究文學與文化層面的過渡時期問題。事實上，如果從整體四〇年代文學的角度來看，戰後初期文學與四〇年代前期的台灣戰爭期文學密切相關，也與五〇年代文學（特別是本土左翼傳統的消亡）的變化不可兩分。換言之，戰後初期乃是日本大和

文化與國府中國文化「重疊」（overlap）的一段時間，不能輕易將之遺忘、收編，而應該將其重要性重新評估。

另一方面，戰後初期所涉及的問題又攸關「後殖民議題」（post-colonial issues）。對台灣研究者而言，從事文學研究常無法不將作者與作品置入殖民與後殖民脈絡中思考。然而，後殖民文學與文化的變化應該是多重而複雜的現象，不能由非殖民國家的文學或認同觀點來衡量（如西方或日本的帝國主義，抑或是中國的次殖民地經驗）。換言之，筆者認為應該發展出一套台灣的「後殖民閱讀策略」（post-colonial reading strategies），藉以解讀台灣作家因應殖民主義而發展出來的思考與美學形態。台灣文學雖受日本殖民影響，也受國府統治影響，但在殖民統治之外，台灣文學作家也極力發展出屬於台灣文學獨特的面貌，其中甚至不乏吸取來自日本或中國的文學養分，對於台灣作家如何進行「後殖民實踐」（post-colonial practices），誠然有待更進一步詮釋的必要。

王莫愁（1924～1985，王育德筆名）在戰後初期的重要報紙《中華日報》日文版副刊「文化欄」，曾發表一篇題為〈徬徨的台灣文學〉的文章，足以用來說明戰後初期台灣作家在時變中的特殊感受。當中他曾就書寫語言的迭遭變動，導致文學創作無法有好成果發出感嘆說：「這乃是受囿於後天的人為因素，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地糾纏不斷，感覺是深受詛咒的文學」，因而他認為：

大多數在學了國語，即使是台灣人也像祖國的老舍、郭沫若、茅盾等人一樣用流暢的白話文寫文學時，從前的小說家們已被遺忘，而被新一代的人所取代了吧？¹

台灣作家是不是被詛咒的一群？由這段話看來，答案是相當令人怵目驚心的。時代為台灣作家所提出的寫作難題，遠遠超過文學自身的範疇，而必須面對文學以外的因素所加諸作家的限制，這說明了台灣文學的傳統，特別是殖民地以來的傳統，和當時的政治變遷具有密切勾連。「戰後初期」作為

¹ 王莫愁，〈徬徨的台灣文學〉（日文），《中華日報》日文版「文化欄」，1946.8.22。

一段台灣文學史上極其特殊的時段，在於當時日本殖民帝國方才撤離，進入了「後——殖民時期」（post-colonial period），而國民黨政府尚未全面「轉進」台灣，這使得日本殖民主義的後續影響，以及國府作為「祖國」化身前來接收台灣所造成的問題，成為這個變動劇烈時代中的台灣作家無法迴避的書寫課題，後殖民時期的作品也因此銘刻了一種「後殖民情境」（post-colonial situation），從而構成我們所稱的「後殖民文學」的文學現象。

二次戰後興起於西方世界的「後殖民理論」，原本即是針對東、西方殖民主義幾世紀以來的殖民論述的消解，以及被殖民國家及人民去殖民化而重建主體性的一種新興理論。如果按照後殖民理論的說法，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從時間上言屬於後殖民時期當無疑義；不過，台灣社會面臨的問題顯然較一般後殖民國家複雜，當終戰後亞非拉三洲的第三世界國家在反省批判殖民經驗時，台灣卻步入一個較日本殖民壓迫更難理解的「祖國接收」時期。

二

2

戰後初期的小說之歷史考察與文本分析

對於「祖國」這巨大而又難以確切指涉的形象，在日本殖民之後，幾乎全面影響了戰後初期所有作家的創作意識。筆者認為，文學文本仍然比起其他文化與文學論述，更具體也更幽微地展示了台灣作家在戰後初期這特殊時代裡的愛恨情仇。因此，為了兼顧史料的重建與文學史脈絡的梳理，同時也想透過實際文本的分析進入台灣作家的心靈世界，本論集中，針對戰後初期數量最多的小說創作進行歷史考察與分析。相關的論文如：

〈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台灣小說的歷史考察〉，文中試圖強調，在「二二八事件」前的小說中，歷經「被殖民」與「被光復」兩個歷史階段的台灣人特殊的精神狀態，使台灣戰後反日小說中出現「雙重意識」（反日／原罪意識）；此外，戰後不久，台灣作家的寫作方向便轉向對「祖國」統治者的治臺方式發出質疑和批判，日據以來批判現實主義傳統再一次被延續並轉化批

判的對象。而關於「二二八事件」後台灣文學界的發展，文中則指出最大的變化有三：一是日據以來台灣本土作家的隱退；二為主要的發表園地由外省的文學工作者來主控；三則台灣新一代的作家的短暫崛起。

〈自我殖民與「近親憎惡？」〉：以吳濁流小說〈波茨坦科長〉為中心看台灣戰後初期的後殖民情境，研究認為：吳濁流在戰後初期寫出的〈波茨坦科長〉雖沒有任何明確的反殖民意圖或方案，但他的確藉著主角玉蘭對范漢智的質疑與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揭露了祖國統治的殖民性格，以及走出孤兒意識的意圖。在吳濁流這些關於解放的後殖民情境啟示下，我們看到「自內解殖」（internal decolonization）的必要，因為解殖民不是在外部殖民退出後就完結，反而在精神結構必須徹底的消除殖民文化的影響，因此要在心靈上解殖（mental decolonization）。

〈從皇國少年到左傾青年：戰後初期葉石濤的小說創作與思想轉折〉，藉由葉石濤個案的分析，文中指出葉石濤接受了殖民者的遺產，某部分心靈被「東方化」了。但藉由這些現代性的遺產，他能夠進行轉化，對台灣歷史、文學乃至於政治，提出具主體性的看法，這就形成他對戰後初期統治問題的批判視角。葉石濤這樣一位具有混雜文化聚合的後殖民主體，由接受殖民教育教養長成的皇國少年（an Imperial adolescent）轉化為左翼青年（a Left-wing young man），再蛻變為台灣本土論者（a Taiwan nativist），足供我們思索一個世代（或更多）知識份子的文學與思想問題。

三



戰後初期的文學、文化論述與史觀差異

除了小說創作歷史考察，以及作家作品分析外，本論集另一個重點則落在當時的文學、文化論述的解讀，以及歷來文學史論述對解讀戰後初期史實所衍生之史觀差異。

關於戰後初期台灣文學研究，在這幾年中，隨著更多史料出土，已陸續

得出不少新穎的詮釋觀點，頗有進境。然而深入考察，我們卻不難發現，由於這一時期相當複雜的政治、文化與文學因素，使得研究者的詮釋觀點歧異甚大，對於同一人物與事件的看法，結論可能南轅北轍，其間終不能免的自然是戰後初期台灣文學的歷史定位問題。我們無法迴避的問題是：究竟，台灣文學的日文傳統為何必然失去它作為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的合法性（legitimation）²？中國性（化）的追求為何難以兼顧台灣文學特殊的文學傳統？文學場域中的權力爭奪，為何與政治場域中一般，由中國大陸來臺作家替換日本作家成為「重建」戰後初期文壇的主導者？台灣本土作家為何一再堅持在中國性之外（或之內），還必須有台灣性存在的空間？凡此，都顯示戰後初期文學研究的膠著之處。

因此，本論集關注的「戰後初期」這一階段文學場域發展之問題，關於這一文學史的側面，歷來也已有不少論文曾經提及，不過，或者著重特定文學社群的傾向，如強調本土文人的受難經驗與台灣意識；或者強調大陸來臺文人的重建文壇與兩岸文人無間的中國意識。然而，著重強調台灣或中國意識的面向，固有其策略上的必然，但對於我們理解文學史的整體發展可能略有不足。筆者比較傾向由「動態」的文學場域板塊挪移過程來觀察，這樣，不僅必須將「戰後初期」視為整個文學史延續的產物，同時也必須注意到同時出現在這一時期文化場域再構築的過程裡，中、臺兩地作家的各種關係，甚且還有舊殖民文化殘留的問題。換言之，一方面要注意日據以來文學場域的發展與延續；一方面則需要對戰後初期的各種現象與活動加以總體的分析，這樣方能對台灣文學史中現實主義與文學場域「再構築」的問題有完整的關照。

戰後初期台灣文學場域之所以稱為進入「再構築」的階段，主要是由於日本文學的力量失去國家機器的支撐而影響力驟降，但其文化餘響透過台灣日作家依舊作用於台灣文學的場域。而另一個新的文學社群，也就是來自中國

² 按照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Bourdieu, 1930~2002）的文化再製理論（Theories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各種資源構成不同形式的資本，在知識份子場域（field）是文化資本，權力場域裡是政治、經濟、社會資本，各個場域也是行動者爭奪合法性的場所。參見邱天助，《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8.3，頁7~12。

大陸（當時所謂外省族群）的作者進入台灣文學場域，伴隨著新興國家機器的合法性基礎，樹立了另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文學領導權，便形成另一次台灣文學場域再構築的問題。台灣文學場域在戰後初期重新構築的過程，就像當時也在進行的台灣文化重構（中國化）一樣，並非「光復」中國文化或文學就可了事。誰代表中國？怎樣的中國文化？誰主導文學潮流？誰有媒體與政經背景的資本？台灣文化／文學中的日本因素如何被安置？這些疑問，在在都逼現出後殖民時期台灣文學場域具有極其複雜的問題有待釐清。

依上述問題意識，本論集從楊逵文學論述、文學史建構與現實主義思潮發展史這些角度，對上述問題提出詳細的考證與分析：

〈行動主義、左翼美學與台灣性：戰後初期楊逵的文學論述〉，文中先由楊逵日據時期的文學論述談起，勾勒其由日據到戰後初期文學論述的演變與特質，論證其依據行動主義、左翼美學與台灣性的主軸，由日據到戰後初期皆積極介入台灣文學與文化之建設的形象。筆者以為，楊逵在日據時期以左翼寫實主義為基調的文學行動主義對抗殖民主義文論，而回到戰後初期的文學語境來看，中國化固然是楊逵看似義無反顧的趨向，但為了對抗官方法西斯統治，他提出立基於群眾利益的左翼民主文化、文學論述。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也對任何忽略台灣性、特殊性的論述提出質疑，正顯示出台灣左翼文學傳統所具備的不能為中國化論述，乃至於中國左翼文學、文化論述所消融、收編的台灣性。

〈發現台灣：日據到戰後初期台灣文學史建構的歷史語境〉，本文在「台灣文學史的建構」這一議題為主軸下，先以日據時期到戰後初期這段時間為切片，梳理出一些在台灣文學史建構過程裡，不同「詮釋群體」（interpretive communities）的差異觀點，以及他們各自以何種族群、階級或政權等立場「發現」了台灣。主要的焦點在日據時期島田謹二與黃得時的台灣文學史論述之比較，以及戰後初期包括《台灣新生報》「橋」副刊之文學論爭等論述中涉及文學史建構的探討。結論認為：戰後初期的台灣作家援引從日據時期以來的文學史傳統，固然與日據時期情況不同，但都是一種「反抗論述」，藉由「類比」被統治經驗所產生的批判視角，使文學場域中文學詮釋的權力問題暴露無遺。

〈戰後初期現實主義思潮與台灣文學場域的再構築：文學史的一個側面〉，更藉由戰後初期現實主義思潮的考察發現，兩岸的現實主義者，存在為重建文壇攜手合作、交流的文學事實，也有文學場域中複雜糾葛的權力競逐、發言位置的正當性與否等面向。結論指出：當「中國化」運動被絕對化時，再好的「良性」中國化也能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壓迫」或「排擠」效應，新現實主義文論的引進或論及台灣有無文學論的例子，就說明戰後初期文學場域一開始就存有的問題所在。其餘如「奴化說」、「禁用日語」、「新殖民地」等更嚴重的問題，莫不由於絕對化的「中國化」有以致之。在面對戰後初期文學場域的發展時，必然需要注意到表面一致的中國化、民主化目標下，兩岸文學詮釋團體因位階不同而產生的差異、壓迫與反抗。

四

4

戰後初期的文藝研究與解嚴後的歷史建構

本論集的另一個關懷面向，則為戰後初期的文化與藝術研究；以及探討在後戒嚴時期一股恢復歷史記憶的風潮下，所衍生的以戰後初期為題材的文學藝術創作。關於前者，除本論集所討論之黃榮燦的木刻藝術外，尚可延伸至戰後初期的美術、戲劇、舞蹈、教育、生活史等層面的議題³，來加以探討；而後者，對一個具有多次被殖民經驗的國家而言，不妨視為另一種類型或階段的後殖民書寫現象⁴，在重述歷史的同時，無疑也因為與當代的族群、認同政治

³ 如李石樵的繪畫、陳大禹的戲劇、蔡瑞月的舞蹈、台灣大學的教育史等，都是有待學界進一步研究的對象。相關研究之參考資料，皆收錄於本論集之參考書目當中，請自行查考。

⁴ 稍加列舉，如小說作品：郭松英，《奔跑的母親》，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2.8。李喬，《埋冤一九四七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10。蔡德本，《蕃薯仔哀歌》，臺北：遠景出版社，1995.11。鍾喬，《戲中壁》，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1995.7。陳雷，《百家春》，臺北：自由時代出版社，1988.8。邱永漢，《香港》，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6.2。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

等議題糾葛一處，而更富解讀的難度。

〈關於虹之虛與實的辯證：評橫地剛《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文中肯定日本學者橫地剛的著作針對中國木刻版畫家黃榮燦研究的成果，不僅提供了這位未受足夠重視的重要美術家與文化人的精密畫像，同時也在廣闊的資料與時代視野中，再次提醒我們重視戰後初期在台灣史中的重要性。但對於其以黃榮燦為理想形象來反襯台灣美術家的「無能」、「疏離」的觀點，筆者認為，左翼黃榮燦之進步性固然令人敬重，但這種詮釋的代價如果是「矮化」全體台灣美術界所換來的，不又落入另一種以國族或左翼標準衡量台灣進步與否的「準東方主義」思考？筆者在此強調屬於台灣的後殖民閱讀策略以回應之。

〈後戒嚴時期的後殖民書寫：論鍾肇政《怒濤》中的「二二八」歷史建構〉，本文則關注鍾肇政於後戒嚴時期的小說創作，是如何呈現戰後初期國府治下的台灣社會？《怒濤》並非一個抵拒日本殖民、重建後殖民主體的文本，但卻是針對戰後初期歷史，在壓抑近半個世紀後，才有機會重建這段戰後初期「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記憶。藉由此作可凸顯出：戰後小說作者的歷史記憶被政權所壓抑，這種延遲的記憶書寫、歷史建構，置於台灣人獨特的歷史經驗中，是否也形同另一種後殖民書寫？弔詭的是，鍾肇政關於戰後初期「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建構圖像裡，提出日本精神對比中國文化的觀點，似乎見證了台灣文化主體的混雜與不完整，應可以提供思索台灣作家如何找到建構台灣後殖民主體性的啟示。

至於所收「附錄」：〈徘徊在「祖國認同」與「台灣認同」之間：戰後初期台灣文化的重建與頓挫〉，則為整合前述論文觀點，由文化認同角度，討論戰後初期台灣知識份子置身在歷史情境中的認同困境，性質上屬於文化論述一類。因當中所舉案例，尚有參考價值，故收為附錄，以供參酌。

臺北：前衛出版社，1993.11。電影作品：侯孝賢，《悲情城市》，1989。侯孝賢，《戲夢人生》，1993。侯孝賢，《好男好女》，1995。林正盛，《天馬茶房》，1999。……等等，都是與戰後初期相關的文藝創作，顯示了此研究範疇的豐富議題性。

五

5

結語：破除被詛咒的命運

這篇導言，基本上交代了本論文集的論述重點在於：擬由史料重建、文本分析、思潮變化三方面入手，將戰後初期這段關鍵時期的台灣文學史料重新加以整理、重組（即歷史考察），同時進行具體文本的分析（即作家論、作品論），並對左翼思潮、殖民主義與現代性思潮、戒嚴文化等影響文學深遠的整體思潮變化加以梳理。目的在釐清從戰前到戰後這段關鍵時期，台灣文學界究竟經歷何種的文化與政治衝擊，進而產生了當代台灣獨特的族群政治與文學政治問題。

換言之，要理解當今台灣文學的問題癥結（從語言、文化、族群到國族認同的分邊對抗），回返到一個屬於過渡階段的台灣「戰後初期」，是筆者認為必要的研究環節，亦是本書最大的關懷所在。

因此，本論集之所以引用王莫愁（王育德）的「被詛咒的文學」一語作為書名，固然是為凸顯台灣作家對台灣文學發展一再面臨厄運的困惑，但也期待透過解析這命運的由來，進而尋求筆者個人與「台灣」的救贖之道。

筆者深信，如果要破除台灣文學「被詛咒」的命運輪迴，讓廿一世紀的台灣文學真正走上自主、活潑的道路，徹底而虛心地理解一九四〇年代中後期的「戰後初期」文學，或許更是我們找到問題關鍵的必由之路。則，本論集盼望，至少提供一個望向遠方的踏板的功能，而能讓我們一同瞭望新生，脫出詛咒！



壹

被詛咒的文學？¹：

戰後初期台灣小說的歷史考察

¹ 「被詛咒的文學」，此語出自王莫愁，〈徬徨的台灣文學〉（日文），《中華日報》「文化欄」，1946.8.22。原意脈絡指涉戰後初期台灣作家，因統治者變換，而陷入轉換書寫語言的困境。本文特加上問號「？」，顯示筆者對台灣文學發展一再面臨厄運的困惑，及尋求解答的問題意識。